

# 以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李元 苏丽娜

## 【核心提示】

-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提升农村牧区资源价值、增强经济效益、激发乡村活力、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途径,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
- 农业新质生产力以高端化、创新性、多要素渗透融合为特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需要重构乡村生产关系,推动农业从“以增产为导向”转向“价值创造”,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驱动、文化振兴和协同治理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

### 以科技创新引领农业高效发展

科学技术创新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强调,“以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引领,以产业急需为导向,加快以种业为重点的农业科技创新,推进重大农业科技突破,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强国建设”。聚焦国家战略性需求和农业科技发展前沿,我们要不断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化农业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坚实支撑。

发挥数字技术的信息化、智能化、高效化优势,利用绿色低碳技术和生物循环技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农业生产中的“绿色含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动农业机械化与精准化,实现农田环境的智能监测与管理。同时,通过政策激励、提供资金支持等方式,鼓励农户积极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缓解农户对投资成本的顾虑,持续推动资源节约,加快构建绿色农业生产体系。

构建农业生产、科研开发和市场运作一体化支撑体系,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加强农村清洁能源建设,如强化对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为乡村生产生活提供清洁、可靠的能源供应,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助力乡村绿色低碳转型。强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将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转化为有机肥料或生物质能源,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探索“工业捕碳、农业用碳”的产业合作路径,通过捕集回收工业部门排放的二氧化碳,用于设施农业增施二氧化碳气肥,帮助高耗能企业消纳碳排放,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和品质。

### 以数字技术促进乡村产业升级

产业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实现形式。生产要素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产业发展的关键路径。生态农村、美丽农村和低碳农村是目前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农村牧区需要依

托自身特有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生态资源,因地制宜推进特色产业培育,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园区和农业产业强镇。依托特色旅游、特色种植养殖、乡村手工艺品等,形成产业链条,提高农牧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通过发展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型销售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增效。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产业链条延伸的有力推手,数字化、智能化、工程化、绿色化、营养化是农业产业发展的新趋向。要恰当运用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对农牧区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等环节进行精准管控和计算。要打破传统产业界限,延长产业链,促进农业与加工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要对市场信息与产品信息进行深度分析,优化市场资源配置,通过合理规划乡村产业布局,以点带线、以线促面,在重点区域打造产业集聚区,引导相关产业向园区集中,推动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产业格局,充分激发乡村全面振兴活力。在发展富民产业的过程中,要优化民营经济投资环境,通过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支持,让民营经济更多地参与到乡村全面振兴的项目中。

### 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信息化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要加快推进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把乡土人才的优势、才能转化为促进乡村发展的动能。借助企业在人才、资金、资源方面的优势以及先进的管理培育经验,通过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模式,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人才培养与乡村信息化需求的精准对接。培育引进农业科技研发、信息技术、经营管理等高素质人才,激励更多的青年才俊、专业技术人员投身乡村信息化建设。

强化乡村信息化人才的教育培训,通过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信息技术、电子商务、数字营销等领域的培训课程,能够提升乡村人才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水平。同时,要构建完善的乡村信息化人才激励机制,提高乡村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在“引育用留”上想办法、找对策、出实招,以政策红利吸引外部人才资源。把握农民群体社会流动性提升的趋势,引导本土人才回流,集聚市场营销、乡村服务、农业科技等各类人才,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配偶就业、职位晋升等方面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人才受益面,打造一支能够稳定留存、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积极贡献力量的人才队伍。

### 以文化建设培育乡村振兴新动能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固本和铸魂工程。要以“特色化、精品化、新质化”为核心,构建“环境共生+工业友好+生态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产业体系。发展新型文化业态,需要培育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助推文化旅游资源数智化发展,实现文化数据开放共享。通过开发创意农牧业、观光农牧业、休闲农牧业等生产模式,将乡村的自然风光、田园景观、农牧产品与文化创意相结合,打造独特的乡村旅游品牌,形成“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文化体验+户外运动+科普研学”的多元乡村旅游产业链。要不断开辟文化新场景体验消费领域,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提升游客的文化体验感和互动性。

乡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地,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够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注入精神动力。要推动乡村文化与现代元素相融合,创新乡村文化表现形式。鼓励和支持乡村艺术家、手工艺人创作更多具有乡土特色的文艺作品,并通过举办乡村文化节、艺术节等活动,展示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乡村传统建筑、民俗活动之中,打造既保留传统韵味又富有现代感的乡土文化景观,塑造乡村文化符号和精神

地标,不断创新文化价值实现机制。

### 以协同治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现代化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协同治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将新质生产力嵌入乡村多元治理主体共享共治的互动平台,能够实现资源要素与实时信息的有效整合。通过数字技术助推乡村协同治理模式的创新与转型,能够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共进。

强化顶层设计,抓好政策引领。以政府为主导,明确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及村民等多元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职责与定位,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治理格局,深化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制度改革,构建现代农村经营体系。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指导,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各类要素资源向乡村聚集,以引入社会资本、共建公益设施等方式,为乡村提供多样化的治理资源和服务,共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精确识别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关键难题与痛点问题。进一步明确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职能界限与工作协同关系,确保村委会在民主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方面的责任得到切实执行。强化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及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功能,发挥村民在决策、管理、监督中的主体作用,提升村民对乡村治理的参与感与信任度,从而激发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要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作用,逐步实现城乡网络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促进乡村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智能化与精细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体系。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提升农村牧区资源价值、增强经济效益、激发乡村活力、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途径,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在这一过程中,要推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优化升级,促进乡村科技、产业、人才、治理等方面要素资源的协调整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升乡村整体综合发展水平。我们要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势赋能,结合农村牧区的资源要素特征和发展需求,引领乡村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促进农牧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

(作者分别系呼和浩特市委党校管理教研室副主任、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 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

□吴银玲

## 【核心提示】

- 加强与京津冀地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共建共保、产业转移协作,突破传统区域合作的“输血一造血”模式,打造“功能互补、价值共生”的协同模式
-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潮中奏响“北疆和声”,需要突破“资源输出—资本回馈”的线性逻辑,通过要素的跨区域再配置与价值链的立体化延伸,构建起“双向赋能”的发展生态

### 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有效调配

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明确提出,“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内蒙古需要加强与京津冀地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共建共保、产业转移协作,突破传统区域合作的“输血一造血”模式,打造“功能互补、价值共生”的协同模式,从而有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践创新。

### 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有效调配

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核心在于实现要素禀赋的动态匹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潮中奏响“北疆和声”,需要突破传统区域协作中“资源输出—资本回馈”的线性逻辑,通过要素的跨区域再配置与价值链的立体化延伸,构建起“双向赋能”的发展生态。内蒙古的清洁能源优势与京津冀的低碳转型需求形成战略耦合,合作不再局限于能源产品的物理输送,而是通过创新“绿电一碳汇”价值转化机制,将能源合作升级为碳排放权的跨区域交易与生态责任的共担体系。这种从“资源交易”到“价值共享”的跃迁,推动区域间要素禀赋从静态比较优势转向动态互补优势,形成了以碳账户管理、生态产品核算为核心的新型合作框架。实践证明,通过完善制度设计,能够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发展资本,从而重构区域分工的价值标尺。

在协同发展中推进农牧业产业链升级。通过构建“生产基地—中央厨房—消费终端”的垂直整合体系,能够形成跨区域产业链条,实现从农产品供给向健康服务、文化体验的延伸。这种“空间链—价值链—创新链”的三链融合,打破了行政区划对要素流动的刚性约束,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内蒙古的优质农产品与京津冀的广阔市场形成有效的供需对接,这种对接不只是农产品的简单流通,更是通过创新“产地直供—品牌共建”模式,推进农产品品牌化与农业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实现从“产品流通”到“品牌联动”的升级,能够促进区域间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以品牌塑造、产业链整合为关键的新型合作模式,从而将农业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提升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在协同发展中推动数字经济做大做强。当前,内蒙古凭借能源、土地等要素优势,正在打造全国绿色算力枢纽,京津冀地区则依托技术、市场等优势,不断创新资源开发应用场景,二者通过“东数西算”工程形成算力供给与数据需求的闭环生态。这种协同合作既非简单的产业转移,亦非单向的技术输出,而是基于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构建起的互为支撑、协同演进的“数字共同体”。通过数字技术的空间再组织,创新要素实现了分布式配置,为破解区域发展“中心—外围”结构提供了新思路。

深入推进区域数字化协同发展,内蒙古的能源和土地资源能够得到高效利用,有效转化为算力资源,而京津冀地区的技术和市场优势能够转化为应用场景的创新动力,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在互利共赢中构建“数字共同体”,不仅能够促进区域间经济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还加速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步伐,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 以协同共治破解生态环境治理难题

对于内蒙古而言,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有效转化,加快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传统生态补偿机制往往局限于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而依托京蒙协作平台,用好草原碳汇交易、绿色产品溢价等市场化手段,能够构建起生态价值的多元转化路径。这种创新不仅体现了

技术层面核算方法的新突破,更在制度层面确立了将生态资源作为“发展性资本”的新路径。通过引进先进的生态监测技术和数据管理系统,能够更精准地掌握生态资源的变化情况,增强生态修复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力度,有效提升生态治理的效果。

强化区域协同治理共识,形成跨区域、多主体参与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合力。要跨区域联合编制生态屏障建设规划,突破环境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建立生态治理权责分担机制,将生态保护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通过量化生态贡献,构建起“成本共担—收益共享”的激励机制,使生态治理从“政治动员”升级为“制度驱动”。要定期召开生态治理联席会议,共享生态保护项目进展、技术创新成果以及政策实践经验,有效提升生态治理决策的协同性和科学性。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跨区域生态治理信息平台,实现生态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共享,为生态环境精准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开辟绿色惠民富民新模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跳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的传统思维,将生态修复、能源生产、民生改善三重目标有机统一,构建“生态+产业”的发展模式,打造“生态资本积累—绿色产业发展—民生福祉提升”的良性循环系统,以生态资本的升值释放激活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跨区域协作发展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产业,带动当地居民的就业和增收,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实践证明,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 切实压减制度性交易成本

区域协同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并非地理距离或经济差距,而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存在。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就要通过制度创新系统性地消解行政壁垒。要建立完善“规划—审批—监管”协同机制,通过统一标准、共享权限、协同决策的体系化设计,将协同成本从“重复博弈”转化为“规则共识”。这种制度创新不仅能够提高合作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够推动区域公共利益的实现,使区域协同发展从“政策推动”转向“规则驱动”。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有效缓解要素错配问题,激发市场活力,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注入新活力。要打造技术交易中心、人才共享云平台等创新载体,通过产权分割、收益共享等制度设计,打破要素流动的行政边界。制订“使用而非占有”的要素配置规则,既保持创新要素的集聚效应,又实现区域间的价值溢出,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贡献智慧力量。

要跨区域共同构建统一市场体系,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要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机制,

实现要素市场的无缝对接,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明确产权归属,保护各方利益,降低要素错配带来的交易成本。

要依托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共同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纵深推进数字化协同治理。政务服务的跨省通办、生态监测的实时协同,实质是治理权力的再配置与公共价值的再创造。

当数据要素穿透行政壁垒实现自由流动时,区域治理便从“物理毗邻”升级为“数字同城”,形成了“数据驱动决策—算法优化配置—平台整合服务”的新型治理形态。

要加强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信息的实时更新与互通,政策、法规、市场等信息的实时共享,降低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决策失误、资源浪费和市场风险。

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提高各方守信意识,

为区域合作提供良好的信用环境。

通过定期举办区域合作论坛、研讨会等活动,加强政府、企业、学术界等多方主体的沟通交流,进一步拓宽信息渠道,深化信息合作,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坚实的信息支撑。

(作者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商务学院)

# 以自我革命破解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难题

□刘春子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变革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加速演进。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的国际舞台上,党和国家面临的改革形势错综复杂、发展任务繁重艰巨、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也将长期存在。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亟需通过持续探索,找到一条能够有效超越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实践路径。

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自我革命是破解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这一历史性难题的核心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历史主动精神、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并屡次强调自我革命对于克服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至关重要性。2015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时提出“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强调,“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以来全党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统一共识,也是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为新征程上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回顾我们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党领导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历经千锤百炼,不断自我革新与蜕变,日益茁壮成长,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放松,在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伟大自我革命。自我革命确保党始终能够与时俱进,引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稳定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面对自身问题、敢于刮骨疗毒的坚强意志和历史担当。

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党在推进自我革命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创新,其中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清除党内政治上的两面人,确保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全党意志统一;加强党的纪律性,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和规矩,对违纪行为零容忍,通过制度建设和执行维护党的肌体健康;持续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党的艰苦奋斗本色;坚定不移推进反腐倡廉,坚决查处腐败案件,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用法治化、制度化手段管党治党,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在新征程上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就要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

党领导推进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有力武器,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保证。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是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关键。党全面领导下的自我革命,不仅体现在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还体现在党能够根据时代发展和人民需求,不断调整和完善政策策略,引领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这种自我革命的能力,确保了党能够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通过不断自我革命,党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从而更好凝聚共识,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改革,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党的领导确保了社会大变革的方向正确、步伐稳健、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我们还要矢志不渝地推进自我革命,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勇于在实践中坚持真理,敢于面对并修正错误,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